

南诏政权与中原儒学的整合机制研究

薛熙滕

四川绵阳，西南民族大学，610041；

摘要：南诏时期彝族的思想文化发展与儒学的传播密不可分，在这一时期从儒学在彝族的传播形式与内容、彝族对儒学的文化价值的认同以及特有的《南诏德化碑》等诸多方面都均体现出文化互动与融合的历史特征。

关键词：南诏；彝族；儒学；文化传播

DOI：10.69979/3041-0673.25.06.086

儒学在彝族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至西汉时期，到了南诏时——以彝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一直依附于唐王朝。《资治通鉴》记载道，上（唐太宗）曰：“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1]在唐朝的“怀柔”策略下，历代南诏王都积极学习汉文化，唐王朝册封皮罗阁为“云南王”，屡次将《诗》、《书》、《礼》、《乐》等儒家经典赐予南诏。《旧唐书·南诏蛮传》有记载：“异牟寻，颇知书，有才智，善抚其众。”^[2]唐朝对南诏的文化输出与南诏彝族自身的文化认同促进了儒学在南诏国的广泛传播。本文将以南诏与唐朝的关系为线索，分析儒学在南诏时期的传播及其文化意义。

1 初期传播：劝民读儒书

1.1 南诏初期的儒学传入与民族融合

南诏初期，细奴逻归附唐朝，开启了儒学传播的初始阶段。细奴逻是南诏的第一代首领，据《旧唐书·南诏蛮传》“迦独生细奴逻，高宗时来朝见，细奴逻生逻盛，武后时来朝见...逻盛至京师，赐锦袍金带归国”。^[3]此为南诏之初民族融合最初体现。细奴逻归唐后推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开元十四年（726）盛逻皮效唐制建文庙，此举具有双重意义：其一，通过《新唐书》等史料可见南诏主动接纳中原礼乐制度，实现文化制度层面的民族融合；其二，文庙作为文化认同的实体象征，标志着儒学从政策推行升华为精神纽带，推动彝族与汉族形成深层文化共同体。这一进程突破了单纯的行政隶属关系，以儒家伦理建构价值认同，为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奠定了早期实践基础。

1.2 南诏国的建立与思想大一统的观念

皮逻阁在唐廷支持下统合五诏，受封云南王（738年），玄宗赐礼乐强化文化纽带。至阁罗凤时期确立“不读非圣之书”准则，特聘中原儒士郑回执教王室，《旧唐书》载其“教以儒书，每授学，回得拊之”，实现儒学教育体系化。异牟寻的深层文化认同，印证儒家思想已超越统治工具层面，成为南诏政治伦理内核。这种以儒家价值观重构边疆政权意识形态的模式，既体现唐朝“大一统”的政治智慧，更反映中华文化辐射力促成边疆民族主动融入文明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2 深入阶段：以回有儒学

2.1 南诏王室的儒学传入与民族文化认同

唐天宝年间，安史之乱后苍山立盟为儒学在南诏彝族传播的深入阶段。这一时期战乱虽使南诏与唐朝陷入了冲突对峙中，但儒学在南诏国的传播并未停下，尤其是在南诏王室上层，儒家文化得到了更广泛深入的传播。天宝十五年，南诏在攻陷嵩州及会同两地时俘虏了西泸县令郑回。“阁逻凤以回有儒学，更名曰蛮利，甚爱重之，命教风伽罗。”郑回在南诏的出现即是儒学在南诏彝族发展的又一新阶段。《旧唐书》记载“回久为蛮师，凡授学，虽牟寻、梦湊，回得捶挞，故牟寻以下皆惮之。蛮谓相为清平官，凡置六人。牟寻以回为清平官，事皆咨之，秉政用事。”郑回时为南诏王室的最高教习，威信之高至异牟寻时期任其为清平官，南诏王室在郑回的教导下学习儒家的诗书礼乐与文化。在当时对其记载是“事皆咨之，秉政用事”大小事都咨之表明了郑回在当时传达儒学文化的所获得的高度认可。从礼乐文化的教化到清平官的委任，可以看出儒学在当时南诏政事中的实际推行与运用。

2.2 《南诏德化碑》反映的民族融合思想

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南诏统治者建《南诏德化碑》，现立于今大理市太和村西面的南诏太和城遗址内，主要记述了阁逻凤的文治武功以及南、唐、吐蕃间的关系以及战争经历。碑文现存损毁只剩七百余字，但在明时的《云南通志》和清康熙时《云南志》等史料皆有录入。关于碑文的作者祝注先先生指出：蛮利就是汉人郑回。实无容置疑。^[2]在《南诏德化碑》其中反映的民族思想主要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

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南诏建国之初便是依附于唐朝，也是在唐朝的支持下一统六诏，“君臣一德，内外无欺”^[3]即是对南唐有好关系的高度概括，碑文直言是“君臣”，君臣之间同心同德才能内外和谐。唐朝支持南诏统一洱海地区与南诏统治者提出“不读非圣之书，尝学字人之术”的思想互为呼应，可见当时的民族融合意识与共同体观念。其后碑文作者表示因“汉不务德”而不得已叛唐，在天宝年间的南唐战争中皮逻阁对唐军的遗骸是“祭而葬之，以存旧恩。”当时的南诏其实力之强可以说在于唐朝的交战中一直处于胜利地位，但南诏统治者却只是保持军事防御的优势，战后祭祀埋葬了唐朝亡兵，并且希望能够于重新归附于唐朝“册汉帝而继好”，“世世事唐”。此碑被刻于国门之上，后来在异牟寻时期，南诏重新归于唐朝时，异牟寻进一步扩大了两国的往来。我们可以看出，南诏与唐朝从一开始就兼有民族融合的思想，唐朝对少数民族有“怀柔”之策，南诏对儒学文化的传播一直进行于国中。即使是在天宝年间，南诏统治者仍旧希望能“继好”，在当时的儒学文化由郑回教于王室也未曾中断过，一直到异牟寻重归于唐，可见文化认同超越政治冲突。

南诏与吐蕃的关系。南诏与吐蕃的关系基本沿着对抗—合作—决裂—对抗的轨迹发展。南诏与吐蕃的“合作”发生在南唐的彻底决裂之后，合作前的背景在碑文中记述到是“小能胜大，祸之胎；亲仁善邻，国之宝。”“亲仁善邻”即是儒家传统思想文化中非常重要的观点。《尚书·尧典》有“协和万邦”；^[2]《左传·隐公六年》提出“亲仁善邻，国之宝也”。^[3]以上皆是主张尊重包容其他各民族的利益，要同其他民族和谐友好相处，互惠互利，以仁爱之心与人为善的思想，体现南诏在处理吐蕃关系时对儒家外交理念的运用，凸显文化认同对政治抉择的影响。

3 扩大传播：本唐风化

儒学在南诏彝族传播的下一阶段是在苍山立盟到蒙世隆反唐时期。南诏与唐朝的关系经过归附—破裂后，经过南诏多方努力以及与唐朝的频繁来往终于在异牟寻时期有了新的进展。《蛮书》有载：“异牟寻每叹地卑夷杂，礼义不通，隔越中华，杜绝声教。遂献书檄，寄西川节度使韦皋。韦皋答牟寻书，申以朝廷之命。”贞元十年（794）正月，南诏与唐朝举行“苍山会盟”以表重归于好。南诏重归于唐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唐朝建立了更深的联系。在文化认同方面，“又请以大臣子弟质于皋，皋辞，固请，乃尽舍成都，咸遣就学...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军府颇厌于廩给。”^[2]异牟寻派遣大臣子弟作为人质去到成都学习儒家诗书礼仪文化，此后五十余年直到丰祐时期，南诏累计贵族子弟一千余人去到唐都。这些质子返国后，多为高官，他们对南诏汉族文物制度的推行自然有带头作用，极大的促进了儒家文化在南诏的传播。^[3]丰祐甚至“慕中国，不肯连父名”；隆舜还遣使入唐，请求和亲。异牟寻在《遣韦皋书》中言道：“曾祖有宠先帝，后嗣率蒙袭王，人知礼乐，本唐风化。”^[4]“本唐风化”则是对这一时期儒家文化在南诏民族传播的高度概括。据唐西川节度使牛丛《报坦绰书》记：“我大唐德宗皇帝，‘闵其倾诚向化，亲蜀来王，遂总诸蛮，令归君长，仍名诏国，永顺唐仪，赐孔子之《诗》《书》，颁周公之《礼》《乐》，数年之后，霁有华风，变腥膻蛮貊之邦，为馨香礼乐之城’”。^[5]由民族融合的发展到民族文化的认同，儒家文化的传播使得南诏社会道德构建与礼乐文化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充分体现大一统观念将中原视为文明归属。

4 普及传播：明三纲五常

蒙世隆时期，南唐关系再次发生变化，直到南诏灭是为儒学在南诏彝族传播的第四个阶段。蒙世隆反唐使得与唐朝关系陷入紧张，然而儒学的传播并未停止，在这一时期儒家文化在南诏的传播已然进入普及化阶段。这时期的民族文化认同主要表现在南唐外交与文化交流建树方面。

从异牟寻时与唐朝重修旧好开始，南诏就长期有规模的派遣子弟到成都学习儒家文化，这些被派遣的子弟回到南诏后在国内宣扬在中原所学儒学，到了蒙世隆继位之前，儒学在南诏的传播已经进入到常态化阶段。这一情况到了丰祐时期有了变数。《资治通鉴》记载道：

“又，蛮使入贡，利于赐与，所从人宴多，杜为西川节度使，奏请节减其数，诏从之。南诏丰怒，其贺冬使者留表付州而还。又索习学子弟，移牒不逊，自是入贡不时，颇扰边境。”^[1]由于南诏所派子弟数量渐长，到唐朝朝贡时所带的随从也随之增多，其所需开支不菲促使西川节度使杜棕上奏希望朝廷削减南诏朝觐的人数，其后唐宣宗的准奏就引起时任南诏主劝丰祐的不满。从外交层面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南诏对中原儒家文化的认同和具体实践。正是因为统治者重视儒家文化，所以才会有多次多人的情况出现。

实际上，在劝丰祐时期南诏已经效仿唐朝的太学、国子监这样的机构建立了两所自己的“文学”（学校）。

《樊古通纪浅述》记载道：“天启五年甲子五月...建二文学，一在峨嵋，一在玉局山，为儒教典籍，驯化士庶，以明三纲五常。其主教者杨波远、杜光迁、杨蛮祐、郑回等。”^[2]这里可以明确知道传播儒学的机构的确在南诏已经存在了。在几位主教中郑回应该是奠基人，杜光迁存疑，而杨波远、杨蛮祐应该都是南诏子弟从成都学成归来且儒学修为较高者。^[3]学校的创办与主教的传播说明了南诏这时期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儒学教育体系，前期从唐都学习归来的学者也确实在南诏向更多民众传播儒家文化。之后到蒙隆舜时期，隆舜在昆明乐饮宴会唐使后，求问《春秋》大义。这也反映出儒学在南诏统治阶级上层的研习常态化，并且有了更深层次的探求。到了唐昭宗光化元年(898)完成的《南诏图传·文字卷》中抄录了南诏王舜化贞于中兴二年发布的一份敕令：“大封民国圣教兴行，其来有上，或从胡梵而至，或于蕃、汉而来，弈代相传，敬仰无异。因以兵马强盛，王业克昌，万姓无妖扎之灾，五谷有丰盈之端。然而，朕以童幼，未博古今，虽典教而入邦，未知何圣为始。誓欲加以供养，图像流行，今世身后，除灾至福。因问儒释耆老之辈、通古辨今之流，莫隐知闻，速宜进奏。”^[4]足见此时彝族地区儒学昌隆的盛况。

回顾”以回有儒学“阶段，儒学主要是在南诏王室贵族阶层由郑回主导教学，但在这一时期，学成归来的弟子与郑回共同在”二文学“主教，由贵族阶层走向士庶阶层，更多的民众能够知晓学习儒家文化，反映出儒学在南诏社会伦理构建中的核心地位。

5 结语

费孝通先生在探究中华民族一体化过程中指出：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看来先是各地区分别有它的凝聚中心，而各自形成了初级的统一体。儒学在南诏时期民族地区的传播正是因为南诏国在儒家文化影响下所展现的统一与的凝聚力，在历史上的每一个阶段的都未曾中断，其连续性与深刻性是随着时间的前进不断深化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南诏时期只是一个缩影，大统一意识是烙在每一个华夏儿女的理想信念中。

参考文献

- [1] 徐奇堂译注，尚书，广州出版社，2001. 06。
- [2] （春秋）左丘明撰；蒋冀骋标点，左传，岳麓书社，1988. 12。
- [3] 李松茂编，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故事 2，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 05。
- [4] 《新唐书》卷 222 《南诏传》中华书局排印本 1975 年版。
- [5] 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考古文物篇卷 10，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 08。
- [6] 李公著，大理南诏史稿，民族出版社，2006. 03。
- [7] 中国彝族通史编纂委员会，中国彝族通史 第 2 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 05。
- [8] （宋）朱熹，赵师渊编撰，资治通鉴纲目 第 9 册，中国书店，2021。
- [9] 李光荣等主编；大理白族自治州王陵调查课题组编，20 世纪大理考古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 11。
- [10] 贺曦. 儒学在南诏国的传播过程及方式论析[J].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33(2): 35-40. DOI: 10. 3969/j. issn. 1671-0304. 2019. 02. 006.
- [11] 刘长久. 南诏和大理国宗教艺术[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薛熙朦，1997. 10. 5，女，汉族，四川绵阳，研究生学术小论文、无职称，历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史·专门史，单位以及邮编：西南民族大学 610041